

# 中國翻譯簡史

——五四以前部分

玄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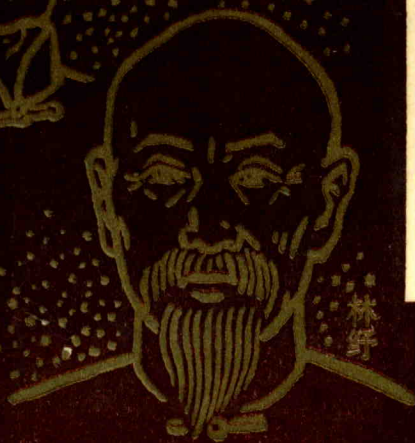
徐光启



严复



林纾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南 木

责任校对：黄素芬

封面设计：钱伟良

封面题字：冒效鲁

## 中国翻译简史

马祖毅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大32开 10.75印张 字数：290(千)

印数：00,001—10,000

1984年7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90220.23

定价：1.50元

## 出版说明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运动以前部分),是一部系统阐述我国自远古迄五四运动以前历代翻译活动的专著。它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作了重点阐述,评介了各该时期的重要译家及其译作,提出的翻译理论与方法,以及有关的翻译组织与规章制度,等等。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翻译活动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介绍了藏、满、蒙、回、维(吾尔)、傣、彝等诸民族的翻译活动及有关情况,充分肯定了它们所作的贡献。

本书史料比较丰富,又注意吸收了当代国内外的若干学术研究成果,并有作者自己的分析和论断,从而概要地反映了我国从古代到近代翻译事业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供广大翻译工作者以及翻译理论和史学研究者阅读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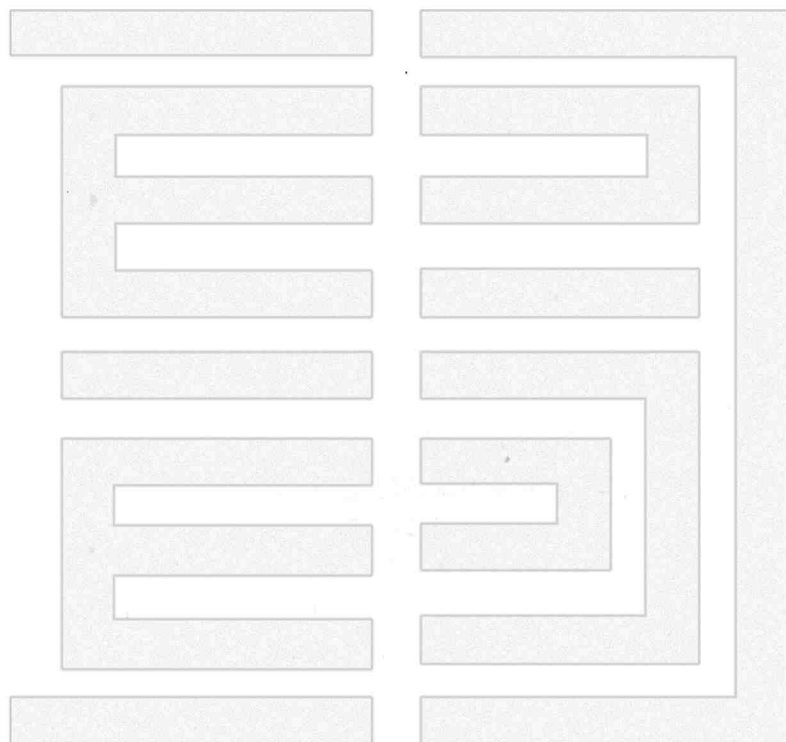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年9月

# 目 录

|                            |     |
|----------------------------|-----|
| 出版说明                       | iii |
| <b>第一章 从周代到东汉桓帝前的翻译活动</b>  | 1   |
| <b>第二章 从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b> | 13  |
| 第一节 佛经翻译                   | 13  |
| 第二节 其他翻译                   | 84  |
| 一、外国文书的翻译                  | 84  |
| 二、北朝民歌的汉译                  | 93  |
| 三、医学历数等类书籍的翻译              | 98  |
| 四、景教、摩尼教、回教等经典的翻译          | 103 |
| 第三节 西藏地区的翻译活动              | 111 |
| 第四节 辽、金、西夏的翻译活动            | 121 |
| 第五节 高昌回鹘族的翻译活动             | 136 |
| <b>第三章 元代的翻译活动</b>         | 141 |
| <b>第四章 从明代到鸦片战争前的翻译活动</b>  | 161 |
| 第一节 明代初中期的翻译活动             | 161 |
| 一、回回历书的翻译                  | 161 |
| 二、《蒙古译语》的编纂和《元秘史》的翻译       | 162 |
| 三、四夷馆的创立与官方的翻译活动           | 166 |
| 第二节 回蒙傣彝诸族的翻译活动            | 172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的翻译活动 | 180 |

|     |                       |     |
|-----|-----------------------|-----|
| 第四节 | 清代初中期满汉蒙藏诸文字的互译·····  | 211 |
| 第五章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 | 224 |
| 后记  | ·····                 | 332 |



## 第一章 从周代到东汉桓帝前 的翻译活动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斯大林也说：“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然而，操不同语言的人要进行“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就必须通过翻译作为中介手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大国，长期以来，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和对外与各个国家的交往，当然缺少不了翻译。

谈到我国的翻译历史，原始社会无文献可考，就是略有文献的夏商两代，现有史料也均失之过简，无从窥测当时的翻译活动。如《册府元龟》里的《外臣部·朝贡》条记载：

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

“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朝非同一部族，语言有殊，遣使来朝，当然需要翻译，否则是无从活动的。然而，这样说只是猜测，拿不出证据来。

到了周代，在这个王朝的疆域之内，就杂居着不少异族。据《左传》记载，有山戎、犬戎、戎州己氏、东山皋落氏、伊雒之戎、姜戎、白狄、赤狄、根牟、潞氏、戎蛮子、鲜虞（中山）等等，种类繁多。拿戎族来说，他们使用的语言就与华族不同。戎族酋长戎子驹支曾经说过：“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西周疆域之外还有更多的种族，例如在东北

有无终，后称东胡；无终之北，还有大貉、小貉。孟轲曾简单介绍过貉族的情况：“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廓宫室”（《孟子·告子下》）。在东南方，则有东夷、徐、楚、吴、越；在西南，有庸、卢、彭、濮、蜀等；在西方，还有秦和西戎。华族要与这么多的异族交往，自然非借助于翻译不可。《周礼》和《礼记》两书里就有关于周王朝的翻译官职的记载。

《周礼·秋官》中说，大行人“属象胥，谕语言”。“行人”是周代负责接待四方使节与宾客任务的官员职称。同书的“秋官象胥”条又进一步说明其职责是“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

《礼记·王制》载有周代所设翻译东、西、南、北各地区少数民族不同语言的官员职称：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后世称翻译人员为“象寄之才”，《册府元龟》设有“鞮译”栏，均是本此。《周礼》中还谈到，周代规定每七年要将各诸侯国的翻译人员集中到周天子所在地加以训练。这也是我国典籍中关于培训翻译人员的最早记载。

关于周代的口译情况，《册府元龟·外臣部》的“朝贡”栏内有这样的记载：

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遥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脩其质（同愤）；化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来使语曰：“吾受命于吾国之黄耆日久矣。天下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则盍往朝之？”

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德既衰，于是稍绝。

来使与周公姬旦的应对，记得比较具体。须知他们是通过三道翻

译才能交流思想的。这段文字,也许是我国最早的口译记录吧。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内还载有以下几条:

周武王克商,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以诫王。自是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弩,长尺有咫。

后芒即位三年,九夷来御。

宣王时,追貌之国来贡。故韩奕之诗曰:“献其貔皮,赤豹黄黑。”

以上记述,虽然简单,但可以从中想见周朝象胥官的活动。

《国语·周语》也有一条记载:

夫戾狄冒没轻僇,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

这里的“舌人”,便是译员。

周朝所管辖的诸侯之国,如楚和越,当时也讲着不同的语言。越语与中原的华语大异,楚语则与华语大同而小异,如《左传·宣公四年》中指出:“楚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日‘斗谷於菟’。”刘向《说苑·善说》里就记载了楚越两国人交际时需要翻译的故事。

据楚大夫庄辛说,当年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日,有个越人“拥楫而歌”。歌词是:

滥兮枻,草滥予,冒枻泽予,冒州州,楫州焉乎秦胥胥,纍予乎昭澶秦逾,滹胝随河湖。

这是越语记音。歌词表达越人对身为令尹的楚王母弟鄂君子皙的仰慕之情。但鄂君子皙不懂越语,不得不请人翻译。歌词是这样的:

今夕何夕兮?

中洲流(又作“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谗诟耻。

心几玩(同顽)而不绝兮，  
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  
木有枝。  
心悦君兮，  
君不知。

后世以《越人歌》名此篇，可以视为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诗歌翻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设有翻译官职，即典客下面的属官。《汉书》卷十九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之令丞及郡邸长丞。……”汉代在交通要道上的西域诸国还设置有主要为汉朝使节服务的“译长”之职，如且末、精绝、于阗、疏勒、危须、卑陆等国各设译长一人，鄯居、姑墨、尉犁、车师前等国则设有译长二人，焉耆国设有译长三人，莎车、龟兹等国设有译长四人。张骞使西域，就有借用大宛和乌孙的译员的情况，事载《汉书·张骞传》。西汉也有“译长”和“译使”的官职。《汉书·地理志》中就提到这一点。

秦汉两代，与北方匈奴打交道最多。匈奴“毋(同无)文书”(《汉书·匈奴传》)，所使用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与汉语截然不同。双方交往，少不了翻译。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载：“王莽建国元年(公元9年)，遣五威将军王骏等六人授匈奴单于印绶。单于佐姑夕侯苏为译”。此事在《汉书·匈奴传》中详述如次：

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遣五威将军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齎金帛，重遣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敝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将率既至，授单于印绶，诏令上故印绶。单于再拜受诏。译前，欲解取故印绶，单于举掖授之。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未见新印文，宜且勿与。”单于止，不肯与。请使者坐穹庐，单于欲前为寿。五威将曰：“故印绶当以时上。”单于

曰：“诺。”复举掖授译。苏复曰：“未见印文，且勿与。”单于曰：“印文何由变更！”遂解故印绶奉。上。将率受。著新绶，不解视印，饮食至夜乃罢。右率陈饶谓诸将率曰：“乡者姑夕侯疑印文，几令单于不与人。如令视印，见其变故，必求故印，此非辞说所能距也。既得而复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绝后根。”……

同传还载有王莽“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咸、咸子登、助三人”之事，在此不赘述。

《史记·匈奴传》“索隐”引《西河旧事》，说公元前二世纪时，匈奴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失去了“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宜牧”的祁连山和焉支山，此后在匈奴人中流传着这样一支歌：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嫁妇无颜色。

此歌在《乐府诗集》卷八十四又作：

失我焉支山，  
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  
令我六畜不蕃息。

唐李泰《括地志》卷四所引《西河故事》则为：

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哪是原译，哪是改译，待考。

对这首歌的解释，历来认为祁连山和焉支山均在甘肃河西走廊，“……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梁载言《十道志》）；又说，匈奴妇女均以胭脂涂面，焉支山即胭脂山，此山既失，无胭脂可抹，妇女因而感到悲痛。陶克涛在《〈匈奴歌〉别议》一文

中力辩其非，作出了新的解释。

关于第一点，陶氏说：如果断定诗中的祁连山、焉支山在今甘肃。则当年月氏族强盛时，即曾占有从敦煌至祁连山之地，其后匈奴西进，月氏族被迫西迁，其未迁走者则据南山（即祁连山）守富楼沙城，被称为小月氏。焉支山亦世为月支地。焉支读作肉支。《史记·霍去病列传》说“去病……出陇西，历五王国，……过焉支千余里。”又说：“去病出北地，遂深入，……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据此，当年霍去病攻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竟须逾祁连、焉支二山千余乃至二千余里之遥，这就从侧面说明：祁连、焉支二山原来就不是匈奴的领地，到去病进兵时，这里也没有匈奴人。既然如此，则二山被汉军攻占或被匈奴攻占，致引起痛惜的应是月氏和小月氏，匈奴既不在这里放牧，则二山的失与不失，与它有何关系？

然则，祁连山、焉支山究竟在哪里呢？《汉书·匈奴传》说：“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其地，攘之于幕北。建边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唐人李益《拂云堆》诗云：“汉将新从虏地来，旌旗半上拂云堆；单于每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匈奴人痛惜的是失去了阴山。陶氏说，阴山，实即祁连山。清人张鹏翮在《奉使俄罗斯行程录》中说：“十八日，行十五里，次归化城北，蒙古语库库阿屯也。……十九日，入城观《甸城碑记》。二十日，行九里，入祁连山（此山亦名祁连，非《元和志》甘、伊西诸州之祁连山也）。”所以，祁连应是蒙古语的 qegel，读若敕勒，意为“广漠的”。祁连山，就是广大的山，符合阴山山脉的特点。焉支即蒙古语 eji，亦可读作阏氏、燕支、胭脂，意为“母亲”。焉支山就是母亲之山，也是阴山。

关于第二点，陶氏说，据《正字通》：“燕脂以红兰花汁凝作脂，产于燕地。”所谓“燕地”，指今河北省，不在甘肃，足见“红兰”不必

尽产在焉支。以为焉支山即胭脂山，即出产涂料的山，显然是一种误解。

陶克涛还用现代汉语译出这首古代匈奴的民歌：

夺去我们广阔的阴山之野，  
我们的牲畜没有地方放牧了；  
夺去我们母亲似的阴山之野，  
妇女们悲痛地失去了美貌。

匈奴没有文字，这便是古代匈奴族留存下来的唯一的文学作品，但不知译者是谁。

可是，东汉时翻译过三首诗，它们不但记载了作者和译者，而且保存了原诗的汉字记音，这真是难得的。这三篇诗便是白狼王唐菆写的《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作诗的年代为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译者是犍为郡椽田恭。现将这三篇歌辞的译文和原文汉字记音一并录下：

#### 远夷乐德歌

大汉是治，与天合意。  
夷译平端，不从我来。  
闻风向化，所见奇异。  
多赐缾布，甘美酒食。  
冒乐肉飞，屈申悉备。  
蛮夷贫薄，无所报嗣。  
愿主长寿，子孙昌炽。

（堤官隗搆、魏冒踰槽、  
罔驿刘脾、旁莫支留、  
微衣随旅、知唐桑艾、  
邪毗缙繡、推潭仆远、

拓拒苏便、局后仍离、  
倭让龙洞、莫支度由、  
阳雒僧麟、莫稗角存。)

### 远夷慕德歌

蛮夷所处，日入之部。  
慕义向化，归日出主。  
圣德深恩，与人富厚。  
冬多霜雪，夏多和雨。  
寒温时适，部人多有。  
涉危历险，不远万里。  
去俗归德，心归慈母。

(倭让皮尼、且交陵悟、  
绳动随旅、路旦揀雒、  
圣德渡诺、魏茵度洗、  
综邪流藩、荏邪寻螺、  
藐浍泸漓、茵补邪推、  
辟危归险、莫受万柳、  
术叠附德、仍路攀摸。)

### 远夷怀德歌

荒服之外，土地烧埵。  
食肉衣皮，不见盐谷。  
吏译传风，大汉安乐。  
携负归仁，触冒险陟。  
高山岐峻，缘崖磻石。  
本薄发家，百宿到洛。  
父子同赐，怀抱匹帛。  
传告种人，长愿匡仆。

(荒服之仪、犁籍怜怜、  
阻苏邪犁、莫殒粗木、  
罔译传微、是汉夜拒、  
踪优路仁、雷折险龙、  
伦狼藏幢、扶路侧禄、  
息落服淫、理历髡维、  
捕莛茵毗、怀稿匹漏、  
传室呼敕、陵阳臣仆。)

白狼王唐菆能写出这三首颂歌，是当时益州刺史朱辅执行睦邻政策的结果。据《后汉书》载，朱辅“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

白狼，一名白兰。据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中考证，“白兰为西羌之别种，其地在今四川理蕃县”。上面三首诗，《东观汉记》只记录了字音，可惜未录下白狼文。然而，这仍不失为语言学上极有价值的材料。

丁文江认为，白狼文是爨文的前身。他据《云南通志》所载爨文与之对照，发现白狼文与僂僂文相同的有二十个字。例如，汉文“天”，白狼文记音是“冒”，僂僂文为“mou”；汉文“出”，白狼文记音是“揀”（音东），僂僂文为“don”。如果拿爨人的各种语言来与之对比，相同处更多。爨文经典，多属四字一句，这点又与白狼王歌中四字句相似（见《爨文刻丛自序》）。

从白狼王歌的汉字记音里，我们又发现白狼文有借用汉字的现象，例如“圣德”为“圣德”，“荒服”为“荒服”，“译传”为“译传”，“臣仆”为“臣仆”等即是（见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此外，由于记音时对同一个音所记的汉字不同，我们又可以从其中推测出某些汉字的古音。例如，与“归”对应的记音为“路”、为“附”，可见东汉时“路”、“附”两字可能同音；与“部”对应的记音为

“悟”、为“补”，可见“悟”、“补”两字当时也可能同音（见方国瑜《么些民族考》）。

总之，《东观汉记》所保存下来的这份材料，对语言学的研究是极为珍贵的。

有人说，公元前二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译过《浮屠经》。其根据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注所引鱼豢《魏略·西戎》中的一段话：

天竺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作“复豆”，按宋徐铉《说文解字注》，“豆”，“徒候切”。“复豆”与“浮屠”同音者，其人也。

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魏晋朝廷都藏有佛经书簿，鱼豢所记，也许用的《魏中经》文，因此“复立”与《晋中经簿》中的“沙律”不同。由此可见《浮屠经》并非一种版本。我国早期译经多是“口授”，《浮屠经》应为我国最早的佛经译本。

任继愈在《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说，大月氏在公元前二世纪移居大夏很快就接受当时的风俗文化，因此在公元前一世纪末盛行佛教并由其来华使者口授佛经，是完全可能的。最早的《浮屠经》大概叫《复豆经》，在佛教流行以后才按当时的译法改为《浮屠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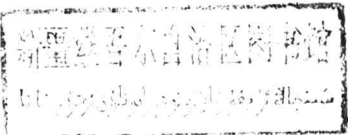
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提出不同意见，说根据现代研究西域历史的学者如日本白鸟库吉认为，贵霜王朝的前二代并不信奉佛教，而大月氏又在贵霜王朝之前，当时是否有佛教流传，颇难断定。尤其是授经者是国家使节身分，这就说明了不但佛教流传，而且为统治阶级所崇信，那就更需要研究考虑了。

牟子《理惑论》中说，东汉明帝“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四十二章经》序中说，东汉明帝“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

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

据此，任继愈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说：“汉代传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佛经最早的中译本。”他在《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又进一步肯定说：“大月氏当时盛行佛教，在西汉末年其王使伊存已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佛经，因而汉明帝时派人去大月氏抄写佛经四十二章是很自然的。《四十二章经》不是一部独立的佛经，是辑录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要点的‘经抄’，它相当于‘佛教概要’一类的入门书。在汉地社会佛教刚流行的时候抄回这种佛经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日本学者境野哲对此经的真伪和译者都提出了疑问。他说，中国最早的经录，即东晋宁康二年释道安所撰的《综理众经目录》未收此经，而最初提到《四十二章经》的牟子《理惑论》也并没记载译者是谁。梁启超亦主此说，进而认为此经是伪造的。日本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一书里说，铃木宗奭根据朝鲜本《四十二章经》第三章里的“佛言，除须法为沙门，受道法，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和第十五章里的“天神献玉女于佛，欲试佛意，观佛道。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以可诳俗，难动六通。去，我不用尔”与《后汉书·襄楷传》《上桓帝书》中“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宁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美饮，单天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互相比较，认为《四十二章经》在桓帝时确已存在，从而断定是桓帝之前传入的。吕澂则予以否定，他指出襄楷上桓帝书里的这两段话，出自安世高的《增一含百六十章》经本。他说，“《四十二章经》不是初来的经，更不是直接的译本，而是一种抄经。就内容看，是抄自《法句经》。我们对出来的有二十八章，占全经的三分之二。这还只是此经相当



于《法句经》的偈颂部分。《法句经》还有缘起，是长行，此经也抄了几段。”“现存的《法句经》是三国时支谦译的。据支谦本序文看，在他之前还有一个译本，所以在汉末时《法句经》就有了”。吕澂特地撰写了《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一文，认定此经是东晋时抄出的（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总之，说我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是《浮屠经》也好，是《四十二章经》也好，均难以作出定论。我国翻译佛经，确凿可考者应自东汉桓帝时安世高译出的《明度五十校计经》始。